

新世纪

编年文选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主编 陈思和
本卷主编 吴义勤

2003 年纪实文学



新世纪

编年文选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主编 陈思和
本卷主编 吴义勤

2003 年纪实文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3 年纪实文学/陈思和主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4

(新世纪编年文选)

ISBN 7-80603-923-6

I . 2… II . 陈… III .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0962 号

本卷主编 吴义勤

责任编辑 吴 兵

装帧设计 宋晓明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60055—5420

市场部 (0531) 2053182 (传真) 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48 × 210 毫米

10.125 印张 243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序：

在“纪实”的背后

吴义勤

纪实文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走向衰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这种衰落的认识文学界的看法显然并不一致。一种代表性的意见认为纪实文学的衰落是由于其文学性、审美性和艺术性的先天不足而造成的，是艺术上的粗糙导致了读者对它的失望；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纪实文学的衰落是由时代因素造成的，90 年代以后的时代转型和时代氛围使得纪实文学成了一种“过时的文体”，不仅作家无意于此种文体的写作，而且读者也没有了阅读此种文体的期待与热情。从理论上讲，这两种观点似乎都能站得住脚，但是细细追究一下，我又觉得两者都是自说自话、不得要领。就第一种意见而言，我并不认为向纪实文学要求审美性、艺术性和文学性就不对，但是我觉得不能以这种要求作为评判纪实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否则就会本末倒置，混淆了对这种文体本质的认识。什么是纪实文学的本质呢？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答案，但在我的理解里，纪实文学的本质就是“纪实”和“真实”，它的魅力和价值首先就应体现在它的“纪实”和“真实”里面，而不是什么审美性和艺术性。换句话说，当我们默认从文学门类中派生出一个“纪实文学”来时，我们就已经默认或原谅了它艺术上的粗糙，我们从这类文体中想得到的显然是其他的东西，而不是什么审美性、艺术性。我想，在纪实文学问题上，以审美性或艺术性说事的人，如果不是无事找事、吹毛求疵，那就是缺乏关于纪实文学的基本常识。试想想，80 年代那些振聋发聩、影响巨大的纪实文学作品，它们的力量有几部是由艺术性而来的？在这里，我倒想重申自己关于文学经典的一个偏见，那就是我

以为“经典”至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真正艺术意义上的经典，这类作品在艺术上的突破可以使我们忘记了历史、现实、思想或者其他的一切；一种是思想、历史、现实意义上的经典，这类作品在思想、历史、现实层面的震撼力可以让我们忽略了艺术、遗忘了艺术。而纪实文学无疑属于后者。就第二种意见而言，时代对文学的影响确实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对文学来说这种影响又只能是相对的。我不相信某种文体只能存在于某一个时代的说法，也不相信时代的变化会宣判某一种文体的死刑。如果说时代影响了文学的话，那么它是同时作用于文学内的各种文体的，它既不会厚此薄彼，也不会厚彼薄此。因此，在我看来，纪实文学的衰落主要还是其内因造成的，当然，这种内因不是什么艺术性或审美性，而是它的本质、它的本体出了问题。刚才，我说到了纪实文学的本质是“纪实”和“真实”，那么决定或影响这种本体本质的因素有哪些呢？一般来说，对时代的洞察与批判、对现实的思索与追问、对历史真相的探寻与叩究、对底层民间的关怀与呼应、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与痛切……等等，都理应是纪实文学本质的题中之义，也是纪实文学获得“真实”的震撼人心力量的根源。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来看待2003年的中国纪实文学，我觉得情况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悲观。当我最终编定《北京城的疼痛记忆》、《重新部落化的世界》、《我想体面地死去》、《亿万富翁孙大午的梦和痛》、《巴格达的陷落》、《〈毛主席语录〉编发始末》、《他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血泪打工妹》、《家有考生》、《前线》、《矿难如麻》这十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时，我不但没有失望和沮丧，相反，倒有一种隐隐的快乐和感动。快乐的是我看到了纪实文学这种文体重新崛起的希望，看到了纪实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无可替代”的力量。感动的是这些纪实文学作品对我们所处时代穿透的力度和思想的深度，它们以如此迅疾和果断的方式冲撞着我们的思想和神经，使我们对自已的国家、民族、人民以及自己的生活有了痛彻肺腑的情感体验与理性认知。2003年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了喜悦和欢呼的中国，也是

一个充满了焦虑和痛楚的中国。这无疑为纪实文学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遇和舞台。对国难的书写、对时代热点的关切、对民间生活和各种前沿问题透视……使 2003 年度的纪实文学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以及思想、情感的真切程度上都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在 2003 年的中国,“非典”无疑是最大的国难,多少人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整个国家的心脏都随着小小的 SARS 病毒而跳动。在“非典”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中,首先应提到的是徐刚的长篇纪实文学《国难》。这部作品是对这场扣人心弦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全方位的记录,作家涉猎之广、开掘之深、情感之真、思想之切都堪称典范,但是由于篇幅太长这本年选只能把它割爱了,不过,无论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认同程度来说,我相信这部大书都是不会被遗忘的。而本书所选的《前线》则是从微观视角、从人性亲情角度切入抗“非典”战斗的又一力作。这部作品从女护士丈夫的角度,去叙述白衣天使的献身精神、生命情怀和心态轨迹。没有夸张的抒情,没有拔高的描写,但是那些真实的生活细节、那些日常的生活片断、那些朴实的心灵记录,带给我们的却是持久的感动和震撼。除“非典”之外,2003 年不断牵动中国人神经的恐怕就是一个又一个矿难事件了。这方面,长江的《矿难如麻》尤其值得关注。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以特殊的方式把我们带到了那一个个撕心裂肺的“矿难”现场,而且更在于作家对一个个消逝的生命背后所掩藏的“真相”的揭露、控诉与诘问。作品对现实批判的力度、情感投入的程度和理性反思的深度都确实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

在 2003 年的纪实文学创作中,除“全景式”的记录时代事件的作品外,对寻常百姓生活的叙述,对个体生存之痛的书写,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也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血泪打工妹》是近年来涌现的众多反映打工妹生活的文学作品中最具有人性内涵和思想力量的作品。作家以点带面,通过对几个打工妹悲惨遭遇的揭示,通过对她们卑微生命的痛悼,通过对她们死亡历程的再现,让读者真切地感到了时代转型的阵痛以及广大小人物所付出的惨痛代价。时代的疯

狂、人性的扭曲、打工妹们的无助都让我们感到心痛和悲哀，我们不能不对历史的车轮投以怀疑和忧虑的目光。而《我想体面地死去》展示一个小人物寻求“安乐死”的精神历程、《亿万富翁孙大午的梦和痛》表现一个农民企业家的“梦和痛”、《家有考生》真实记录“高考”对中国广大家长和考生的精神压力和心理扭曲、《他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剖析人体摄影艺术展发起者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和情感经历，涉及到了当代中国最为前沿的敏感问题……这些作品也确实构成了对我们时代心灵史和生活史的一种独特扫描。但是关键的还不在“扫描”，这些作品打动我们的更是作家们在“纪实”背后的思考，他们的焦虑，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忧愤，他们的求索，都使得“现实事件”被上升成了一种“思想事件”或“精神事件”。而纪实文学的品格以及它的力量也随之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也使我更坚定了对纪实文学的认识：纪实文学的力量不在于现实本身，甚至也不在于“真实”本身，而在于作家从“现实”背后挖掘了多少、发现了多少、呈现了多少。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在这本纪实文学选中，《北京城的疼痛记忆》、《重新部落化的世界》、《巴格达的陷落》以及《〈毛主席语录〉编发始末》四部作品与我们通常的纪实文学不太一样。这是我的一种尝试，我觉得纪实文学的文体应该是开放而自由的，只有开放而自由的文体才能更真实更全面更自如地记录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的生活。《北京城的疼痛记忆》关注北京城的保护问题，表面上没有惊心动魄之处，但是它所触及到的“真相”，所带来的思考却是强烈而持久的。《重新部落化的世界》解析与我们当代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广告”问题、《巴格达的陷落》阐释刚刚发生的伊拉克战争，虽然两部作品都更多“理论性”而较少“纪实”的感性色彩，但我觉得它们同样是对我们置身的时代和世界的一种“真实”的描绘，是另一种形态的“纪实文学”。《〈毛主席语录〉编发始末》是当事人对影响中国几代人的《毛主席语录》编发历史的回忆，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更在于让我们又重温了一段特

殊的精神史和心灵史，这历史联系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刻唤醒着我们反思和自省的自觉。我以为，这样的纪实文学作品也确实是我们所需要的好读而又耐人回味的佳作。

当然，2003年的纪实文学远非上述作品所能涵括，肯定还有许多好的作品被遗漏和忽略了，这一方面是篇幅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我个人的阅读视野和认识偏见所限，不当和偏颇之处还请读者诸君批评。

目 录

1/	序：在“纪实”的背后	吴义勤
1/	北京城的疼痛记忆	张英 王军
17/	重新部落化的世界	王 晓
28/	我想体面地死去	李 梁
36/	亿万富翁孙大午的梦和痛	万静波
47/	巴格达的陷落	朱增泉
59/	《毛主席语录》编发始末	韦梅雅
83/	他，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杨筱懋
136/	血泪打工妹	胡传永
181/	家有考生	吴苾雯
222/	前线	华 夏
247/	矿难如麻	长 江

北京城的疼痛记忆

张英 王军

像一个离家外出很久的人突然踏上回家的路，北京这座中国最具有魅力的城市开始了它的历史寻根，对它在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的发展和建设进行了回望与反思。在经过近几十年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之后，这座城市的面貌已经是焕然一新，彻底改写了它原本留给人们心中的固有形象。昔日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所熟悉的风景、街道、建筑已经所剩无几，只能从电影、书本、古画、歌谣里寻找了。

作为回望与反思的结果，北京市政府在年初宣布了重建永定门的建设计划，按照历史重建自己城市的文化标志。在中国众多城市飞速建设发展而城市面貌单一没有个性的背景下，北京市的这一举动格外引人注目。有趣的是，这一消息被当地媒介公布以后，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大的反响，反而在文化界、新闻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对北京这个城市来说，永定门城楼曾经是它历史发展进程中耀眼的文化标志与形象代表，重建和恢复对于这个伟大城市在新世纪的形象建设与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昔日的拆除到今天的重建、复原，历史中间是一个大大的圆圈，我们的城市由起点又回到原点。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北京拆掉了那么多的古城门，为什么会单单重建永定门呢？原因直接明了：永定门是北京历史文脉中轴线的起点，而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作准备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汇集了50%以上北京奥运会设施）正位处中轴线的北延长线顶端，不修复永定门，中轴线是不完整的。在北京市最新公布的城市规划中，重建永定门是北京市的中轴线规划方案中重要的一点。

对北京这样一座古城来说，被誉为世界奇观的北京城市中轴线就是它几百年城市发展的灵魂。北京旧城的传统中轴线初步形成于元大都时期，经明清两代的发展建设并保留至今。传统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7.8公里，以紫禁城为中心，以景山为制高点，曾被誉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以此轴线为核心的北京旧城的总体布局和城市艺术也赢得了各种赞誉。轴线全长近7.8公里，始建于元代，在明代中期形成如今壮伟的景象。在这条南北贯穿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正阳门、故宫、景山、鼓楼、钟楼等大型建筑相次矗立，颜色均为金红二色为主调，周围衬托着绿枝出墙、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北京中轴线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城市建筑艺术线，众多大型建筑一字压在轴线上，构成了北京的脊梁，而脊梁两边，是中国传统城市布局里讲究的对称与均衡：左安门对右安门，广渠门对广安门，东便门对西便门，崇文门对宣武门，朝阳门对阜成门，东直门对西直门，安定门对德胜门，其间是数十平方公里城市建筑民居的对称。

尽管北京的老城门大都消失已久，但是它们仍然是今天北京都市生活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北京人对老城门所在区域依然以其旧名相称，就仿佛它们依然伫立在那里一样。一代又一代的北京人，在城墙下生老病死，他们把自己朝夕相处的城墙当成自己生活的一

部分。在今天，它已经成为价值连城不可再现的风景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公路、地铁车站、桥梁，今天的年轻人，包括记者在内，已经没有福气亲眼目睹那些城墙楼阁了，北京城这个称呼，只活在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的语言里，随风消失。

永定门系北京明清外城城门之一，《明史地理志》载：“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重城，抱京城之南，长二十八里。”永定门为其一，前有箭楼，后有城楼，中间为瓮城，为外城七门中最大、最平要的城门，城楼顶起脊，飞檐三滴水；城楼为三层，廊面阔七间，进深三间，通高二十六米；箭楼有箭窗两层，每层七孔；箭楼面宽十二点八米，瓮城宽阔。永定门是北京城中轴线的南起点。

史书上记载，1264年，忽必烈在火烧金中都之后，在其东北方向择址建元大都，即明清北京城的前身。当时的规划设计师利用现北京什刹海、北海一带天然湖泊的辽阔水面和绚丽风光营造这个城市。为了使中轴线不湮没于湖水之中，设计师在圆弧状湖泊的东岸划出了一条南北与湖泊相切的直线，切点在今天的后门楼，形成了北京今天的中轴线。明灭元后，改建了元大都，中轴线位置依旧并向南延伸，及至16世纪修筑外城，终于形成了今日所见的这条雄伟的建筑长廊。到20世纪中叶，这条轴线仍保存完整，由南至北，依次为永定门、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紫禁城、景山、地安门、后门桥、鼓楼、钟楼等。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他的文章《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这样描述了自己眼中的中轴线：“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对列的大街，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作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过了此点，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民国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

空间的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峭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作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二

极为壮观的城墙、城门和城楼，构成了历史上北京城意象。根据文物专家在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燕都遗址的考古结果发现，文物部门宣布公元前 1045 年为北京建城之始。也就是说，三千年前，原始的北京城就建立了，砌起它最初的城墙，在漫长的岁月里，城墙由短到长，北京城由小到大，政权变迁帝王更迭，那些纪录历史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只有无语的城墙仍然存在着，记录着历史的每一个瞬间。

北京城墙的变化始于 1900 年，当时义和团起义，在大栅栏廊坊头条焚烧专卖西药的老德记药房，大片民房遭灾，大火一直烧到正阳门，箭楼被毁。接下来是印度兵在正阳门城楼内取火，引发火灾，城楼被毁。八国联军用大炮轰塌崇文门箭楼和朝阳门箭楼，正阳门城楼与箭楼、朝阳门箭楼后于 1903 年初为当时的袁世凯政府修复。为解决交通问题，八国联军把铁路从马家铺建到了正阳门，拆除了永定门东侧和东便门处城墙，并在崇文门瓮城开洞，现存的前门火车站就是当时的建筑。自此，火车可以自由出入北京古城。

1912年2月27日，曹锟在袁世凯授意下演出一场保袁世凯不南下当总统的闹剧，即“壬子兵变”，将皇城之东安门烧毁，以恐吓南方革命党。

1915年，当时的北洋政府为解决交通问题，在当时的内务总长朱启钤（中南古建筑专家，后创办中国营造学社）的主持下，将正阳门的瓮城拆除；同年，北洋政府拆除了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瓮城，修建一条环城铁路。民国初期，政府当局还拆除位于天安门两侧的围墙，将当时被称为“天街”的长安街打通，保留天安门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修通景山和故宫之间的道路。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东城和西城之间的交通不便的问题，但不改变皇城布局。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段祺瑞在天津马厂举兵讨伐，并对北京发动中国军事史上的首次空袭。飞机向清宫干清殿、中正殿投弹，所幸古建筑未遭大的破坏。此间，“讨逆军”不拟进行攻城战争，想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称是为了不使古城遭到军事破坏。最后，“讨逆军”拆菖蒲河一段皇城墙，进攻南池子张勋住宅，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复辟失败。

1921年，政府当局拆除德胜门危残失修的城楼，在此前后，皇城的东城墙、北城墙被相继拆除，拆除的城砖被用来修建明壕和地下排水暗沟，一些发臭的河流被填掉。随后不久，宣武门的箭楼作为危楼被拆除，木料被售卖。对此当时的报纸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拆除这些建筑的原因是政府没有钱发工资了，所以才拆卖墙砖发薪水。

1928年，国民党军队北伐，张学良军队撤出北京，北京改为北平。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军队进攻北平，“卢沟桥事变”发生。28日晚，蒋介石命令二十九军南撤。次日，北平城沦入敌手。根据日伪政府的档案显示，日军侵占北平以后，1939年曾经出台一个规划方案，在五棵松地区建设一个新城区；日伪政府还在北平内

城东城墙与西城墙各开一个豁口，称之为启明门和长安门（日本投降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将之更名为建国门、复兴门）。

1946年，北平回到国民党政府手中，在日伪政府的规划方案基础上，当局提出规划方案，在五棵松城区基础上，建设新北平。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9月，新政协会议以后，北平改为北京，将天安门前的华表、石狮向斜后方移动，于前方树立旗杆。由于北京城内人口众多，一些地方垃圾成山，河流水质恶化，加上没有完整的下水道排水系统，蚊虫满天飞，臭不可闻。人民政府动用军队，花大力气整治环境，清除掉了那些污染北京大街小巷的垃圾，下水道也得到了清理，荒废的湖泊被疏浚出来，河水得到了净化，建设了大量的市政工程，深得民心爱戴。

解放后不久，刚刚被确定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古城正酝酿着一次彻底的改建，这时，梁思成已经成为政府任命的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不久，书生意气的梁思成与留学英国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合作向人民政府提交了一个完整保护北京古城，并将新中国的政府行政中心置于北京古城以西（公主坟与月坛之间）建设的计划。

梁思成提出将城门作为交通环岛即可方便交通，并在城墙上置花池、建凉亭，使之成为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梁思成这一计划遭到了当时对政府工作和决策影响巨大的苏联专家们的反对，他们更愿意在北京看到一个他们熟悉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红场的翻版，坚持必须以天安门为政治中心，扩建广场，以备群众游行所用。苏联专家们指责梁思成的计划是放弃老城重建新城，是巨大的浪费，如果在老城建立行政中心，可以利用现有设备和资源。他们还提出了计划，沿长安街大街建立政府各单位机关的行政大楼，在今天的长安街上，仍然有许多那个时期的建筑。

在北京市长聂荣臻的主持下，北京市召开城市规划会议，梁思成、陈占祥等中国专家和苏联专家到会，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作《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苏联专家团提出《关于

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

巴兰尼克夫在报告中说：“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在建设行政机关房屋的问题上，巴兰尼克夫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最好先改建城市的一条干线或一处广场，譬如具有历史性的市中心区天安门广场，近来曾于该处举行阅兵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光荣典礼和人民的游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由此，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

苏联专家团作的《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则对巴兰尼克夫把行政机关建设在旧城中心区的计划进行了论证，并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驳，指出这是不经济的，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建议书说：“为了北京市将来的发展和加速建设，关于建筑行政房屋的位置问题是重要的，有的建议在城西五六公里，所谓‘新市区’日本人开始建筑城市的地方，建筑行政房屋。这个建议的意义是在新地区建筑房屋能便宜，政府职员的住处距离政府的房屋不远，在这里建立政府中心区的全部建筑。按我们的意见，新的行政房屋要建筑在现有的城市内，这样能经济的并能很快的解决配布政府机关的问题和美化市内的建筑。”

建议书还着重论证了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城内的经济性问题，提出“认为政府的中心区建筑在城外经济是不对的。在苏联设计和建筑城市的经验中，证明了住房和行政房屋，不能超出现代的城市造价的50%—60%，40%—50%的造价是文化和生活用的房屋（商店、食堂、学校、医院、电影院、剧院、浴池等）技术的设备（自来水、下水道、电器和电话网、道路、桥梁、河海、公园、树林等）。拆毁旧的房屋的费用，在莫斯科甚至拆毁更有价值的房屋，连同居民迁移费用，不超出25%—30%新建房屋的造价。在旧城内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的建设和技术的设备，但在‘新市区’是要新建这些设备

的。”

建议书还以莫斯科的经验阐述道：“当讨论改建莫斯科问题时，也曾有人建议不改建而在旁边建筑新首都，苏共中央全体大会拒绝了 this 建议，我们有成效的实行了改建莫斯科。只有承认北京市没有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情形下，才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完全可以想像梁思成、陈占祥听到这番言论的心境，他们正是因为“承认”北京的“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才提出建设新市区的设想，以期北京旧城得到整体保护。可是，苏联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指出他们否认北京的“历史性和建筑性的价值”，甚至是“放弃”旧城。而在行政中心区放在城外是否经济的问题上呢？苏联人提出的在城外建设住宅和行政房屋需配套占造价 40% - 50% 的文化、生活设施是有道理的，但是，当时方圆 62 平方公里的北京旧城人口已达 130 万，密度已经很大了，可建设用地十分有限，如果把行政中心建在城内，势必导致大量人口迁到城外，而这些外迁人口的住房同样也是需要配套文化、生活设施的，因此，很难以文化、生活配套设施问题来说明梁思成的设想是不经济的。

在会议上，阿布拉莫夫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毛泽东认为政府机关应该在城内。这位苏联人还武断地提出，建设新市区“就是承认市内一百三十万的人口对政府是没有益处的”，弦外之音，谁能不察？

苏联专家坚定地认为要改造北京旧城，与 1931 年的莫斯科城市规划有关。后来在 1953 年，梁思成随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时候，苏联建筑科学院副院长格也格也罗曾对他说：“1931 年莫斯科总计划的国际竞选中的许多方案不是要把旧的莫斯科完全铲平重新另建就是要把它当一个‘博物馆’保存下来，在郊区另辟新城。斯大林同志指出了那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合实际的幻想，把计划的正确道路指出，制定了改建的总计划。这个计划无论在城市的整体建筑形式上都是发展的：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预见今后新的远景的发展。”